

逾40家金融机构设立首席合规官 强监管下合规治理升维

中经记者 张漫游 北京报道

又一家银行加入设立首席合规官的行列。9月11日,瑞丰银行(601528.SH)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在其

从“要我合规”到“我要合规”

合规文化的建设需要从高层开始,机构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要率先垂范。

9月11日,瑞丰银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两项议案,在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中,该行在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中新增了“首席合规官”。

从行业整体来看,今年以来,银行机构设立首席合规官的动作明显加速,且已有多家银行的相关举措获得监管层批复。其中包括华夏银行、哈尔滨银行、吉林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内蒙古农商行、海南农商行、始兴大众村镇银行等。

同时还有多家银行发布了首席合规官的招聘信息。例如今年8月,江西银行(01916.HK)发布专业人才招聘启事,其中总行首席合规官、苏州分行合规官、广州分行合规官各1人。上饶银行5月7日发布招聘信息,公开招聘首席合规官1名。

不仅在银行业,《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已有43家金融机构首席合规官获得监管核准,涵盖保险公司、理财公司、集团财务公司等。

2025年3月正式施行的《金融机构合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中提出“金融机构应当在机构总部设立首席合规官”。

记者从哈尔滨银行方面了解到,自设立首席合规官以来,该行积极开展系列内控合规管理优化。包括加强内控合规体系建设;常态开展制度落实专项整治;积极

他高级管理人员中新增了“首席合规官”。

瑞丰银行并非个例。今年以来,华夏银行(600015.SH)、哈尔滨银行(06138.HK)等多家银行纷纷设立首席合规官或发布相关招

聘信息,保险公司、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也加入这一行列。

在监管合规与现实风险双重压力之下,金融机构正系统性提升合规管理能力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43家各类金融机构

首席合规官任职资格获监管核准。业内专家指出,设立首席合规官不仅是满足监管规定的必要举措,更是机构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风控、从制度约束迈向文化构建的关键一步。

2025年银行首席合规官任职资格的批复情况统计		
银行	首席合规官	批复时间
龙江银行	冯宝升	2025/9/5
吉林农商行	徐久胜	2025/8/28
济宁银行	刘强	2025/8/26
广西北部湾银行	陈捷	2025/7/17
海南农商行	何浪	2025/6/27
瑞穗银行(中国)	马俊	2025/6/13
内蒙古农商行	赵纲	2025/5/16
哈尔滨银行	管公明	2025/4/25
始兴大众村镇银行	周伟	2025/4/21
吉林银行	翟壮	2025/2/18
华夏银行	杨宏	2025/2/7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 刘洋/制图

做好法律支持和合规服务;提升合规监督质效,扎实组织推进全行内控合规检查及专项检查,统筹落实监管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内部追责问责精准有效,着力推进全行风险化解;强化专项风险管理,加强案件管理与警示教育,构建新反洗钱管理体系、提升反洗钱数据报送质量,规范关联交易报告、披露职责落实,组织开展业务连续性应急演练,保障重要业务持续稳定运行。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指出,金融机构尤其银行是经营货币信贷的机构,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比如银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吸收公众存款,向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金融机构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合规管理要求高于一般企业。金融机构必须坚持合规经营,培育合规文化,引导员工增强合规意识,不断提升合规经营管理水平,只有这样才

能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股东、客户、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锡军指出,基于其在金融领域的实践经验,金融机构在引入首席合规官后,往往对公司运营及合规管理带来显著影响。以银行为例,一方面,从组织结构看,设立首席合规官标志着银行对合规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由总行直接管理,并与业务部门保持相对独立,这在以前是不常见的做法。另一方面,从认识层面看,首席合规官的设置提升了银行对合规工作的重视,合规不再仅仅是部门职责的一部分,而是由专门的高管负责,凸显了合规工作的核心地位。

大成律师事务所方面认为,合规文化建设是金融机构合规管理体系的灵魂,也是实现从“要我合规”向“我要合规”转变的关键所在。合规文化的建设需要从高

层开始,机构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要率先垂范,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充分体现合规理念,通过自己的行为向全体员工传递合规的重要性。

北京财富管理行业协会特约研究员杨海平向记者分析称,首席合规官的设立是商业银行合规管理体系升级的标志。从长期来看,首席合规官设立通过以下方面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品牌信誉、市场竞争力:其一,开展合规文化建设,升级合规管理理念,强化“合规创造价值”“合规从高层做起”“从被动合规向主动合规转型”等理念;其二,推动合规管理与风险管理的融合与协调;其三,规范新形势下商业银行业务创新,进一步明确合规导向;其四,适应监管环境变化,大幅度压降监管处罚事件;其五,提升合规管理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升级全行合规管理能力,优化全行合规管理体系,促进业务稳健发展。

首席合规官能否成为风险“减震器”?

商业银行处罚减少、合规性增强将是设立首席合规官带来的正面影响。

金融机构密集设立首席合规官的背后,不仅是监管合规的要求,也是现实风险压力的直接反映。

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国际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及派出机构共开出381张百万元涉及银行的罚单,其中,上半年最大罚单为某股份行五项违规业务被罚没6723.98万元;下半年最大罚单为某民营银行违反账户管理规定、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等5项业务,被罚没1387万元。2025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国际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共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了149张百万元以上的大额罚单。而9月以来,就有10家银行被罚,合计罚款约1.629亿元。

不仅是银行业,证券行业的监管处罚同样严厉。企业预警通依据监管公开披露统计,截至2025年6月26日,2025年上半年国内已有64家券商被监管处罚,包括对券商及其从业人员的处罚。

大成律师事务所方面向记者提供的一个案例显示,自2024年以来,某省农村信用社系统发生的系列违规案例成为金融监管领域的热点事件,这些案例虽然主要涉及传统的信贷业务违规,但其反映的合规管理体系缺陷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据监管部门通报,该省多家农村信用社在贷款“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工作中严重不尽职,存在调查不实、审查不严、检查不力等问题;在关联交易管理方面,部分机构未能有效识别和管控关联方,存在向关联方违规放贷、利益输送等行为;在内控制度执行方面,许多机构虽然建立了相关制度,但执行不到位,监督检查流于形式。监管部门对涉事机构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不仅对机构进行了高额罚款,还对相关责任人员实施了禁业处罚,部分高管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这一系列案例的处罚呈现出明显的“双重处罚”特征,即机构处罚与个人禁业并重,这与《金融机构合规

管理办法》的立法精神高度契合。

从深层次看,这一案例反映了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在合规管理方面存在的系统性问题:合规意识淡薄、合规制度不健全、合规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合规文化建设滞后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根本解决,不仅会影响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合规官的设立有助于减少商业银行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风险,通过强化合规管理和内控,约束机构和个人行为,确保业务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及内部规范,从而降低违规行为带来的处罚风险。”赵锡军谈道,“虽然从外部视角可能难以直接观察到业务层面的明显变化,但长期来看,商业银行处罚减少、合规性增强将是设立首席合规官带来的正面影响。这些变化表明,商业银行通过强化内部合规管理,不仅能够提升自身运营的规范性和风险控制能力,也有利于满足监管要求,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在平衡业务创新与合规管理方面,杨海平认为,当前领先实践就是由合规管理内嵌到业务创新流程之中,将懂业务的合规管理人员派驻到业务部门,深入业务和产品逻辑中,精准把握合规底线。

记者从哈尔滨银行方面了解到,该行首席合规官积极组织、监督内控合规管理部门,在新产品研发、新业务推广等环节,强化与业务部门协同联动,防范合规风险隐患。具体看,一方面是积极开展制度合规审核。监督各单位在落实法律、规则、准则要求,实施管理改革,推进业务创新时,坚持“制度先行”原则,及时建立管理制度,内控合规部在制度发布前组织进行合规审核,强化合规支持与服务工作质效,确保经营管理活动有规可依,扎牢制度防火墙。另一方面是有效开展新产品/业务洗钱风险评估。将风险控制关口前移,将合规要求从“事后风控”变为“事前和事中设计”,在新产品、新业务上线前完成洗钱风险评估工作,确保在设计开发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将反洗钱管理要求有机融入,严把风险准入关。

27亿元增资补充资本 武汉农商行经营挑战犹存

国资控股

中经记者 郭建杭 北京报道

随着武汉农商行国有股权占比有望由38.45%升至57.56%,在增资完成后该行或将成为国有控股农商行。

近期,联合资信对“武汉农商行2025年科技创新债券”出具的评级报告中,披露了该行增资扩股进展:武汉农商行7.71亿股增资扩股项目对应增资金额为27亿元,由7家武汉国资企业出资,增资完成后,武汉农商行总股本将增至67.69亿元,国有股份持股比例将由原来的38.45%大幅提升至57.56%。该评级报告指出,增资事项仍在流程中,相关资金已经计入其他权益工具。

武汉农商行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目前武汉农商行处于改革转型的关键期,在持续推进相关工作。”

监管批复信息显示,2024年12月11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批复武汉农商行7.71亿股增资,对应增资金额27亿元,增资方分别为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光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城建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

业绩临考

武汉农商行2024年年报显示,全年营业收入78.43亿元,同比下降3.7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2亿元,同比跌36.73%。具体来看,利息净收入(主要是存贷利差)为67.73亿元,同比下滑11.13%;非利息收入上涨101.89%,达到10.7亿元。某区域银行人士告诉记者:“息差收窄或者坏账拨备增加等原因会影响银行的盈利能力,最终体

政策红利

武汉农商行国企股东持股比例提高的情况并非孤例。近年来,地方国资增持渐成趋势,多家城商行、农商行都推进或完成定增,实现国有股权占比提升。例如,内蒙古银行在今年8月份完成增资后,新增股份均由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出资设立的内蒙古财信集团认购;增资后,内蒙古银行国有股份占比提升至65%以上。上饶银行在完成增资扩股后,国有股占比由2024年年末的54.16%提升至约67%。此外,多家新组建的省级农商行采取地方国企控股模式。例如,

限公司、武汉市江夏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7家武汉国资企业。

联合资信的评级报告指出,增资完成后,武汉农商行合计股本67.69亿元,武汉光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占比提升至10.11%,武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增加至8.80%。经测算,此次增资完成后,武汉农商行国有股份持股比例上升至57.56%。

现为净利润下滑。”

近年来,武汉农商行净息差持续收窄,2022年至2024年的净息差分别为1.88%、1.74%和1.41%。不良贷款率方面,该行2022年至2024年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76%、2.94%和2.94%。在资本充足率上,2024年年末该行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1.09%、9.91%和9.71%;从集团口径看,三项指标分

此次增资扩股将为武汉农商行带来怎样的实质性影响?

评级报告中指出,武汉农商行获得武汉市7家法人合计27亿元增资,资本实力有所提升,为未来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武汉农商行存贷款市场份额在当地排名靠前,同时作为地方性金融机构,其对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当地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当

别为11.09%、9.89%和8.82%。

对比来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商业银行(法人口径,下同)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0%;2024年年末,我国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整体充足,资本充足率15.74%,一级资本充足率12.57%,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11%。

面对挑战,武汉农商行正通过

出现经营困难时,获得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支持的可能性大。

评级报告中同时指出,区域内市场竞争力较强。武汉农商行在武汉市网点布局密度较高,远郊区网点布局使得其在小微、“三农”及科技创新等领域客户实现良好的积累,且能够对本地政务业务资源进行较好把控,叠加人缘地缘、决策链条短等优势,其存贷款市场份额在

高层调整与战略转型积极应对。

今年上半年武汉农商行迎来了新任领导。该行在4月发布消息显示,周玉萍、刘炜分别以该行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参加2025年度工作会议,在工作会议上周玉萍指出,2025年武汉农商行将在“转方区、调结构、提质量、增动能、开新局”上持续用力,在探索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奋勇前进,

当地排名靠前,区域竞争力较强。武汉农商行建立了符合自身经营发展需要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体系,增资扩股完成后,其国有股份持股比例将进一步提升;股权质押比例较低;风险管理制度体系持续细化,相关体系执行及有效性水平有所提升;战略发展规划符合自身发展需要,且可执行性较强,关注发展战略后续实际执行效果。

以新担当新作为开创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

公开资料显示,周玉萍在加入武汉农商行之前,曾在湖北省工商银行系统任职,之后担任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融部副部长、部长,武汉金融资产交易所总裁、党委书记,武汉金控集团副总经理等职;刘炜曾任职于汉口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后进入光大银行。

“国有资本可以在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和支持银行稳健经营中发挥关键作用。一是加强国有金融机构最低资本管理。银行防范风险的底线和基本要求在于确保最低资本要求。二是强化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国有资本通过加强资本管理、财务监管、重大事项管理等,提升地方国有金融机构风险防控能力。三是支持地方金融改革化险。地方国有资本通过参股控股、专项资金支持、政策性补贴等方式,帮助地方银行处置不良资产、补偿风险损失等,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杨长汉说道。

贷资源投向基建、民生等重点领域,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杨长汉告诉记者:“地方国资入股地方区域性银行,可以战略性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现代化发展。地方国资入股地方区域性银行,强化‘财政主导型’的金融管控模式,有利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个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有利于地方经济金融协同发展,有利于财政金融协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银行具有放大金融资产规模、提高社会融资可得性、为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实体经济输入新鲜资金‘血液’的独特、强大的功能。”